

黃埔將帥

第 二 卷

黄 埔 将 帅

主 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中砥柱中流

《淮南子》有云：“历利剑者必以柔砥”、“剑待砥而后能利”。

黄河三门峡东有一岛，屹立于黄河滚滚激流之中，人赞之为“中流砥柱”，在那 10 年浩劫年代，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逆流中，不仅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巨大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者。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和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长达 10 年之久。最后，终于战胜了群魔，为民除害，写下了自己的辉煌历史。

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稳住局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横祸从天而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中国大地，狼烟四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深感这场大革命来势凶猛，直接关系到党、国家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天下越乱，军队越要稳。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

叶剑英同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以后又下达指示，军队“文化大革

命”限制在 23 所院校中进行；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强调各大军区要重点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的正常秩序，等等。

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却遭到林彪一伙的强烈反对。1966 年 10 月 5 日，林彪下令强行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并宣布取消军委总政关于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此后，一些军队机关院校纷纷成立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在北京甚至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形势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更有甚者，在北京召开的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鼓吹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诬蔑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

但是，林彪一伙对叶剑英的意见，置若罔闻，继续利用他们的权力，在全国全军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舆论，煽动军内 10 万余人的“造反派”进京冲击各总部军事机关，直至国防部和中南海，揪斗许多军队的负责同志。

叶剑英感到，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首都局势难以控制，军事统帅机关将陷于瘫痪。这年冬他在西山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紧急聚会，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破坏党、破坏军队、迫害老干部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随后经过商量，决定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告》，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

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告，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公开对抗，打击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气焰

面对全国混乱局面，如何收场，如何稳定局势？叶剑英等认为，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于同年11月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和各总部负责人参加大会，并接见了到会人员。会上，军委几位副主席就军队及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我们军队院校要作好榜样。下面不是贴了不少大标语吗？从中可以看出你们要见毛主席，我们支持。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在运动中，有些机关、有些院校没有搞好，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谬误。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领导运动的人要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他们不懂得这点，不懂得列宁讲过的跨过真理一步就是谬误。这些事不少了。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毛主席说过，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的。不要不准人家革命。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

误,允许人家革命。

同志们要见毛主席这是很自然的。有很多是外地院校来的,想见毛主席。你们都见过了毛主席了吗!见过没见过呀?见过了,还想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比见毛主席更重要!你们要理解毛主席的心情,毛主席对你们青年寄托很大希望。我们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院校同志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当圣经念。现在,许多同学能把《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地背下来,就跟我们过去念孔子的书一样。我们过去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家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要有阶级感情。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再说一遍,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去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台下有人递条子质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4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告诉大家,4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叶剑英和几位元帅在大会上的讲话不胫而走,受到老同志和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拥护,却遭到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的痛恨,指责为“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在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要批斗几个元帅。批判陈、叶讲话的大标语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林彪等鼓动下,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馆再次召开10万人参加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贴满了批判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标语。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自到

会场看望大家。陈毅首先讲话，希望大家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接着，叶剑英正气凛然，再次讲话。他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他说，我不是发脾气，我与同志们远的无怨，近的无仇，又不认识谁是张三，李四，劝大家赶快回头，回校闹革命，做一个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

叶剑英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两个“10万人大会”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录。当年林彪一伙企图利用它打倒叶剑英和几位老师，而叶剑英却通过这个讲坛教育青年走正路，给青年的错路诱使者们当头一棒，致命一击，给在场的青年吃了一副清醒剂。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为叶剑英在这两个大会上的讲话喝彩叫好！

但是，此事并未了结。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下，造反派代表强烈要求陈毅、叶剑英收回讲话，公开承认错误，江青向造反派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我叫叶剑英来向你们当面认罪。”叶剑英以沉默表示抗议。江青和康生一起鼓动造反派再开个10万人大会批斗陈、叶。请贴发两种：中央文革发红的；给叶剑英、陈毅发白的，最后通牒。

叶剑英毫无畏惧，埋头攻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从中汲取力量，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在12月8日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上说：“不是搞‘大民

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叶剑英面对造反派给他贴的大字报，气愤地说：“大字报尽管贴，话我还是要讲！”

愤怒泄诗情。叶剑英给他的同难老战友陈毅填《虞美人》词一首，以示慰藉。词曰：

“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陈毅读后连叫“绝妙好词！”并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评读。”

“10万人大会”余波未息，真个是“串连炮打何时了？”事情闹到毛泽东那里，他只好出面调停，劝老师们：“检讨一下，了此一案。”这一年的12月31日，年终岁尾，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奉命作了一次违心的“检讨”。江青皮笑肉不笑，又来讨好：“你检讨什么？”叶剑英愤怒地说：“我不欠帐！”

但是，“检讨”归“检讨”，此案还是未了。造反派并未罢休，斗争锋芒继续指向几位元帅和革命军队。他们酝酿再召开“批资反路线斗争”大会，揪斗陈、叶，只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出面制止，才未开成。

被诬为“二月逆流打一炮”的“黑干将”

1967年是中国走向灾难深重的一年。新年伊始，“一月风暴”从上海向全国各地越吹越猛，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林彪一伙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初，打倒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林彪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进一步抛出了经过林彪批准同意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纲领和措施，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

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林彪、江青等煽动下,反军乱军的妖风大作,一时刮得天昏地暗。全国各大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纷纷向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告急求救。叶剑英责无旁贷,来者不拒,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他在西山的住所,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轮番睡觉,分批开饭,然而揪斗之风却有增无减。

为了保护革命领导干部,稳定部队,稳定局势,中央军委从1月8日起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继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警惕敌人乘虚而入。他说,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参部分瘫痪了,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他特意让江青看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警告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叶剑英的斗争得到周恩来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从而保证了军队的稳定。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怀恨在心,蓄意制造更大的反军乱军事件。

1967年1月19日,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有40余人参加和扩大的碰头会。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大肆叫嚷:军队必须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主张军队不搞“四大”。叶剑英严肃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

备任务很重,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这时,叶群、陈伯达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开火。逼着肖华出席当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10万人大会,去说清问题。叶群还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治部工作,阴谋以此打开总政缺口,篡夺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极为愤慨,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这一次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但是,会后走漏了消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到景山东街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跑出,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第二天上午,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在继续,斗争更为激烈,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面对江青等人责难,严厉指斥,正气冲天。

对于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的“一二〇”事件的经过情形,当时会议记录人之二的李文芳(叶办秘书)回忆说:

“剑英同志坚持按党性原则办事。他高瞻远瞩,识大体,顾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但对违背党的利益的行为,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把个人一切置之度外。1967年1月,京西宾馆军委那次扩大会议,19日下午未开完,20日上午继续开。会议开始,徐向前追查昨天会议泄密责任,没有结果。江青等质问肖华昨晚到哪里去了!这时叶剑英拍案而起,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才告诉我,马上到医院检查,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包扎起来。当时,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肖华了。陈伯达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因为安眠药吃多了,会上说的话要收回来。”

“叶剑英对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早有察觉，多次说过，这伙人来头不小，我们要警惕啊！所以，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很坚决。这是他的坚强的党性和高尚品德的体现。”

“大闹京西”之后，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经林彪同意，搞了个《军委八条命令》。毛泽东审批后，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全军执行。

为了进一步贯彻军委命令，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受到全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在这两次会上，“三老”“四帅”与林彪、江青一伙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的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

队吗?”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会上谭震林、陈毅、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厉声指责张春桥等,最后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拂袖而去。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根据江青旨意拼凑了所谓“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歪曲事实,捏造罪名,诬陷“三老”“四帅”等,在江青安排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怀仁堂事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会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接着,在怀仁堂连续多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林彪、江青一伙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在全国上下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实际上停止了政治局的活动。

江青一伙变本加厉,继续猛烈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遭到围攻。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在林彪、江青一伙干扰破坏、加紧迫害的极其困难境况下,叶剑英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经过酝酿,请示毛泽东,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100多名军以上干部出席的会议,着重解决军

队在“三支两军”(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统一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在会上数次发言,就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怎样开展正面教育,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统一思想。

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便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林彪突然到会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尽管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干扰破坏,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是两个“大闹”(“京西”与“怀仁堂”)的继续。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刮起“十二级台风”。风头所向:一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元帅作“检讨”;三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肖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四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五是制造“七·二〇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六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七是散布耸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几位元帅和高级将领;八是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会议;九是制造“扬、余、傅”事件,诬蔑几位元帅是“黑后台”;十是将叶剑英的子女、亲属投进监狱,成立“黑专案”,大搞逼供信,罗织诬陷叶帅的罪状,必欲打倒而后快。与此同时,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挑起“全面内战”,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

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

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在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指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两年以后,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正式为“二月逆流”平反。这一年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蹲点调查。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装订车间向工人学习,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

这段时间,叶剑英在北京孤苦渡日,但仍乐观豁达,不亢不卑,与逆境作斗争。他的小女儿文珊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艰苦的日子,特予摘录:

“在那动荡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岁月里,林彪一伙处心积虑想把爸爸搞垮,诬蔑他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硬说他的孩子们都有问题,横加罪名,把我的哥哥、姐姐、姐夫们一共7个人投进了监狱,甚至连家中的保姆也被抓了进去。我那时只有17岁,为了保护我,爸

爸把我送到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叔叔那里，当了一名通讯兵。谁知这事让江青知道了，她把傅司令叫去大喊大叫说：‘叶剑英的女儿怎么能守总机呢？！在这样的机密部门工作，走漏了消息怎么办？要把她抓起来！’当晚傅司令打电话给爸爸，说我跟班长吵架了，团结不好，让家里速来人把我接回去。我离开的第三天，就发生了所谓的‘扬、余、傅事件’，傅崇碧叔叔被抓起来了。我当时也不能在北京呆下去了，于是远离爸爸去福建当兵。记得当时爸爸对我说：‘很可能是傅崇碧救了你。’几年以后，当爸爸得知傅司令被放出来了，立即让我去探望他，他告诉了事情的真相，并说：‘你爸爸把你交给了我，我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起来，所以制造了一个借口，把你转移出去了’。

“我离开北京以后，就剩爸爸一个人孤寂度日，行动受到限制，连打电话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我们一家被搞得支离破碎的逆境里，爸爸和儿女们剩下的惟一联系就是一封封家书。‘家书抵万金’。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为了慰藉孤寂的爸爸，我经常提笔给他写信。我在家信中流露了我的担忧，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和生活情形，可爸爸乐观，风趣的回信安慰了我。他写到：‘信中问到二号楼（作者注：叶剑英在廂红旗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他把自己比作古庙里的和尚）。女儿有假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从这封平常的信里，我看到爸爸临危不惧、善于自处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得到很大的安慰。不久，爸爸被迫到工厂劳动，那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好，但他却精神饱满，觉得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工作，每天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叶’。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我每天到工厂向工人同志学习，受到教育很深。’他很遵守劳动纪律，除了完成分配的任务，还利用机会作调查研究，向厂里的领导干部和工人们了解生产情况，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生活。他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中，热情赞扬工人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说工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敢于提出改革的意见。’并说自己‘落后

了,赶上去吧!’

“我在福建当兵的3年间,爸爸常常写信开导我,教育我,要我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把头脑武装起来,嘱咐我在前线利用机会学军事知识和技术,不忘战争,希望我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天天压缩一点。’并对我每一微小的进步都感到欣慰,连我的字写得如何都注意到,一次来信中写到:‘来信,字儿写的仔细,不像以前鸽蛋大了,也照着格子写,一行行地像个读书人,谈谈工作,谈谈学习,也亮出思想,总得说近一二年大有进步,进入了社会,懂得人生,爸爸高兴你的成长。’”

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仍然极为关注。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于1969年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1969年3月下旬,他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报毛泽东主席。

以后又受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多次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叶剑英同其他几位元帅一道,在讨论中精辟地阐述“中、美、苏大三角”的关系,提出建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林彪一伙对叶剑英等的迫害步步加紧,不仅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围攻,而且更恶毒的是,借口所谓“紧急战略”疏散的需要,加紧逼迫叶剑英和许多老同志一道离开北京。叶剑英奔赴湖南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徙于岳阳、湘潭等地,饱受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眼相待和百般羞辱。

叶剑英年逾古稀,身处他乡异域,儿女们或在监,或致残,分离离散,孤苦伶仃,但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他每天坚持读书,锻炼身体,虽“处江湖之远”,未敢忘国,犹念中央,关注世界风云,常吟诗填词以明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他亲身体验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读“离骚”自慰，以“行廉志洁”自励。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还利用各种机会，参观工厂、农村和名胜古迹，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提出改革建议。

叶剑英从岳阳回到长沙以后，又被赶到湘潭，直到1970年7月，突然接到通告，飞回北京，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8月23日，叶剑英在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预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的反革命集团当头一棒。叶剑英旗帜鲜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积极参加“批陈整风”。他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等地，深入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这个政治骗子的反革命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打响了第一炮。

于危难中受命，排除阻力，请邓小平复出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迹，
地下应渐汉李陵。

叶剑英写下的这首诗，是林彪“九·一三”叛逃机毁人亡的真实写照。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撤销原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建立由叶剑英负责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